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成果

王琪延 / 张卫红 / 龚江辉 著

第一手生活时间
和闲暇活动的调查资料

第一部用时间描述
城市居民生活的著作



经济科学出版社

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

THE TIME ALLOC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成果

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

王琪延 张卫红 龚江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北京

责任编辑：齐伟娜
责任校对：段健瑛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舒天安

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

王琪延 张卫红 龚江辉 著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public2.east.net.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出版部电话：62630591 发行部电话：62568485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河北永清后奕装订厂装订

787×960 毫米 16 开 13.5 印张 260000 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5058-1752-3/F·1241 定价：2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王琪延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7
ISBN 7-5058-1752-3

I. 城… II. 王… III. 市民-时间-管理-研究-北京 IV. C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9893 号

本书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成果

生活时间分配研究课题组成员

组长：	王琪延	中国人民大学
	朱维盛	国家统计局
成员：	王 军	北京市统计局
	徐 辉	国家统计局
	贾俊平	中国人民大学
	张卫红	中国人民大学
	龚江辉	北京师范大学

110406/1

前 言

生活时间的分配和利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综合反映。因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时间，而在每一个时间点上，人们都进行着各种有序的活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生活时间分配的意义是不同的。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由于大生产的连续性，要求人们精确地计算时间，特别是大城市居民，大体在相同的时间起床、就餐、工作、休息，人们在支配生活时间的同时，也同样被生活时间所支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科学技术进步，先进运载工具、通信工具和运算工具的变革，换言之，人类已经悄悄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或所谓信息时代，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运用都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时间可以相对压缩，也可以相对延伸，工作时间趋于逐渐缩短，闲暇时间趋于逐渐增加，从而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社会，财富的尺度已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还表现为闲暇时间及其利用状况。可以这样说，闲暇时间及其利用已经成为财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做过许多论述，他曾经指出：“在未来社会，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关于如何认识时间，如何安排和利用时间，特别是闲暇时间，以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促进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关于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的实证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其中，1924 年苏联的斯特鲁米林所做的关于苏联城市工人生活时间的调查研究和 1959 年普鲁登斯基做的相同课题的调查研究，比较有影响，反映了苏联城市工人生活方式的变化。1960~1966 年，在萨拉（Szalai）的指导下，由美国、苏联、比利时、法国等 12 个国家的许多研究机构协作，完成了多国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和比较研究。进入 80 年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国民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95~1996 年由欧洲统计联盟策划的欧洲生活时间分配调查，这是一项大型的调查研究活动，提供了有酬劳动和劳动市场外的劳动（如家务、义务劳动等）、闲暇等等各项活动时间资料，为研究老龄、性别差、福利等问题奠定了基础。日本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是从 1941 年开始走向正规化的，日本的 NHK 放送局每 5 年进行一次生活时

间分配调查,1976年日本总务厅统计局第一次进行了该项调查,此后,也按5年为周期进行定期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我国对于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的调查研究,始于80年代初期,但是,至今尚未在全国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调查,只是在部分城市或地区进行过一些零散的工作,无论是在指标设置上还是在调查方法上都尚未成熟,关于生活时间分配的研究可谓刚刚起步。

城市的功能之一是为全体居民创造更为良好的生活环境,其中,居民闲暇时间的多寡,闲暇活动的丰富程度以及闲暇设施的满足程度如何,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新的尺度。1994年实行五天工作制以后,城市居民各类生活时间的变化及其利用情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了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状况,研究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人员的工作、生理、家务、闲暇等各类生活时间分配情况;为研究居民的体育、学习、兴趣爱好、娱乐、义务服务、游园和旅行活动,从而把握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实态,为城市进行精神文明建设、闲暇设施建设及制定有关行政措施提供依据;为了给分析和研究城市的社会问题提供基础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统计局社会处组成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研究课题组,作为北京市社科“九五”规划研究项目,于1996年10月3日至10日以北京市18个区县15岁以上的居民为对象进行了抽样,对抽出的9个区县的173户437位居民,实施了以“自记”和“他记”方式相结合的调查。

本书依据该次调查资料,结合北京市的一些具体情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希望以此促进我国的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研究工作,并为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本书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例如,通过生活时间分配与消费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生产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思路(如北京市体育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再如闲暇活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化建议等。

生活时间分配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调查,是既花时间又花经费的,在我国,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对此课题迟迟不予问津,我想这是其中原因之一。在该书出版之际,我非常感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经费上给予的支持,特别是主管该课题的刘娟同志,为该课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并为课题的推广做了很多工作。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管理世界杂志社、北京统计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众多媒体对该课题作了报导或研究成果的介绍。在此,我代表课题组向媒体的编播者表达谢意。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研究成果是无法让大众了解的。在资料的取得方面,我衷心地感谢在1996年下半年选修统计学的全体同学,他们把这次抽样调查当做一次重要的实践活动,非常出色地协助我们完成了调查任务,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们至少要多化几十倍的时间。课题的完成与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杜厚文副校长对该课题研究予以的鼓励和鞭策,成人高等教育学

院杨干忠院长、陈兴宾副院长及教务处高志清处长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都铭记在心。

本书由王琪延、张卫红、龚江辉撰写，王琪延负责了本书的框架设计和总纂工作，并对全书负责。

本书作者欢迎各位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激励和指导我们对该课题的继续研究。

王琪延

1999年2月于日本

环日本海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生活时间分配	(1)
第二章	多重视角下的生活时间分配	(16)
第三章	关于 24 小时的预算	(29)
第四章	为社会的义务：工作时间	(48)
第五章	自身的再生产：生活必需时间	(59)
第六章	为家庭的义务：家务劳动时间	(69)
第七章	娱乐与个性发展：闲暇时间	(79)
第八章	生命在于运动：体育活动研究	(86)
第九章	愉快的一天：文娱活动研究	(96)
第十章	生涯加油站：终生学习活动研究	(107)
第十一章	风景这边独好：旅游活动研究	(116)
第十二章	向他人和社会贡献：公益活动研究	(127)
第十三章	设计一个灿烂的人生	(134)
附录一	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表	(146)
附录二	1996 年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	(156)
	1996 年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目录	(157)
	主要参考书目	(201)

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 生活时间分配

生活时间的分配和利用状况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综合地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时间，而在每一个时间点上，人们也都进行着各种活动。货币和实物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或地域限制，而时间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都是相同的，因此，利用时间这个指标，可以最准确地衡量和比较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第一节 生活时间分配的概念

一、什么是生活时间分配

生活时间分配是指人们将某一段时间（如一天、一周、一生）资源在各项生活活动上的配置。例如：1997年我国城市居民工作日的24小时平均分配到工作（含通勤）活动为8小时13分，其中男性为8小时51分，女性为7小时40分。生活必需活动为10小时14分，家务劳动为1小时27分，闲暇活动为4小时07分。从上例可以看出，生活时间分配是人们支出在各类生活活动上的时间数额。通过此数据可以反映出各类活动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反映出人们实际的生活内容。

可以设想，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家庭的人生活时间分配的项目、内容和支出量都是不同的。例如现代人与原始人相比，用于工作的时间量是大大不同的，原始人如果不全天劳作，就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维持生活，而现代人则可以有较多的时间用于娱乐或其他非工作的项目。

时间可以成为测定人们的生活活动以至全部社会过程、社会现象的一种尺度。从广义上说，运用时间尺度来测定生活活动、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的方法就是时间分

配，也称为时间预算。狭义地说，时间分配或预算是指用于研究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周期内，为满足物质的、生理的和精神的需要而用在从事各种不同目的上的活动时间支出情况的一种系统方法。本文正是在后面这种意义上使用时间分配或预算概念的。

时间预算概念中的“预算”一词取自家庭或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算收支账这层含义。如，一个月内花了多少钱，收入多少钱，钱都花在什么用途上等等。但在时间预算账上却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这一项。如果说有的话，这种收入也是固定的，即每天只有 24 小时，不论用何种手段，都不可能增加或减少这种收入。因此，时间预算实际上是研究人们的时间支出、时间分配状况的。正因为如此，“时间分配”也作为“时间预算”的同义语使用。通过了解人们各类时间的消费支出状况，可以研究人们的各种活动及其运用时间的整体效益。

时间预算研究包括以下不同层面的事项：

(1) 活动内容。即在一定时间周期内（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等）何人、何种群体从事何种活动（如吃饭、睡觉、工作、开会、看电视等）。

(2) 活动顺序。即何时、在什么活动之前或之后从事某项活动。

(3) 活动的时间量。即从事某项活动占用时间的长短。

(4) 活动频率。即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等）从事某项活动的次数，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一定时间区间内或在某一时间点上参加某项活动的人占总体的百分比；第二，在一定时间区间内，某群体或个人参加某项活动的次数或平均次数。

(5) 活动空间。即在何处从事某项活动。

二、生活时间的历史变迁

在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人为了生存需要，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利用极其简单的工具，终日辛苦地劳动，“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物”。^① 生产劳动时间占去了大部分生活时间。他们的全部时间除去生产时间之外，大致上就是生理活动时间，用于闲暇的时间是较少的。只是偶尔地在劳动间歇或渔猎丰收之时，举行一些简朴的欢庆仪式。有关资料表明，原始人一生中的劳动时间占 33%，闲暇时间占 16.6%。^②

到奴隶社会，社会分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奴隶主阶级，另一个是被奴役的奴隶阶级。奴隶的劳动时间几乎占用了除生理必需时间之外的所有时间，即使是生理必需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集，第 49 页，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② 【罗】格·普·阿波斯托尔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79 年版。

间也处于被管制之内。因为奴隶社会是奴隶主以卖身契和锁链占有奴隶的全部时间。

在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所憧憬的生活。在落后的耕作方式下，农民的大量时间主要是花费在土地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年到头终日在田里劳动，操持家务。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过着封闭、隔绝、愚昧的生活，很少有闲暇时间。据统计，农业社会的人，一生中的劳动时间占28%，闲暇时间占22.9%。^①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机器的采用，劳动力的素质的提高，使劳动生产率达到空前的水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工作时间相应缩短，闲暇时间相应增加。统计资料表明，工业社会人的一生中劳动时间占10.4%，闲暇时间占38.6%。^②

但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是相当残酷的。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拼命延长工作时间，攫取绝对剩余价值，强迫工人每天劳动10个小时以上。对于工人来说，每天劳动之后，觉还睡不够，那里谈得上闲暇时间的业余娱乐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形象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这种悲惨的生活境遇：“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工人（即庄稼汉）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13~14个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4个小时的额外劳动。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了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是怎样干活累死的。时装女工平均每天劳动16.5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③

在旧中国的工矿企业，工人的劳动日普遍长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在18小时以上。上海纱厂中流行的所谓“礼拜工”，竟要工人连续工作20小时，而后才能得到一点休息。

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同资产阶级展开了反对延长劳动的斗争。英国工人阶级从19世纪初开始，整整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才迫使政府颁布了一些工厂法，先后把童工、女工和成年男工的劳动日限制为12小时、10小时。1866年，美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提出“三八制”的口号，要求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闲暇，并为此同资本家进行顽强的斗争。20世纪20年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鉴于工人运动的兴起，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如洛克菲勒财团、卡耐基财团都已把经营目标指向社会福利事业。1914年议会通过了“劳动保护法”等，试图通过限制劳动者的工时，保障工人体力的恢复和为从事再生产而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由于工人运动的活跃和工人阶级的斗争，1919年国际工人联合会通过了“三八制”的工作制，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率先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

① ②【罗】格·普·阿波斯托尔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 《资本论》第一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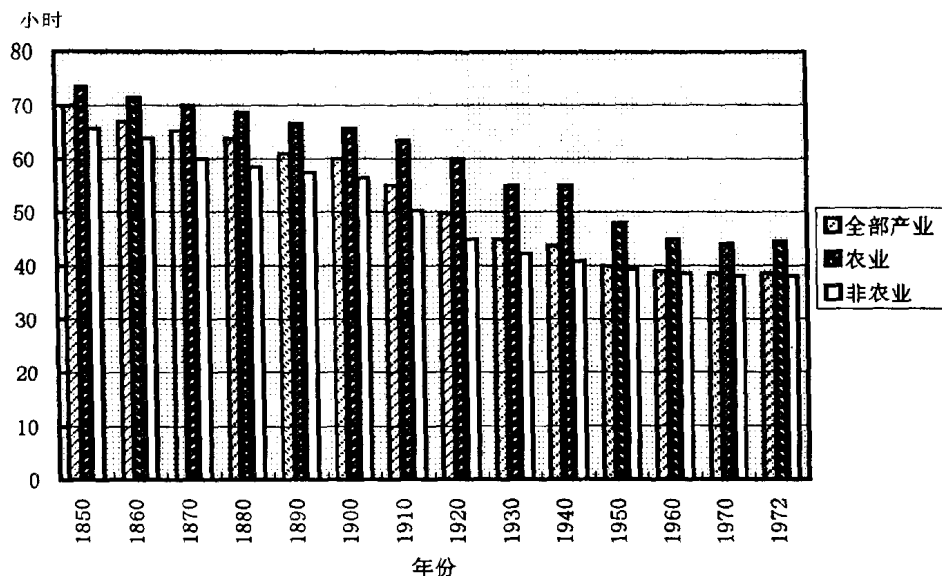


图 1-1 美国工人工作时间变化图

图 1-1 是美国农工业工人工作时间的减少趋势，由图中可以看出，从 1850 年到 1972 年的 122 年间，工人周工作时间从 69.7 小时减少到 37.6 小时，共减少了 32.1 小时，即减少了一半。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弹性工作制”、“半工制”、“在宅工作制”等新型的劳动制度，工人劳动时间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周一至周五上班，周末两天休息的常规已被打破，夜间工作的人愈来愈多。工作日不上班和周末上班以及节假日加班加点也变得更加普遍。“弹性工时制”正慢慢取代传统的工作周。目前，西欧各国约 1/3 的工薪者，即 3500 万人实行“弹性工时制”。在英国，这一比例甚至已达到 51.8%。大量的夜间工作一方面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保证与处于地球另一面的分公司同步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夜间电力、通信线路、计算机主机等闲置的资源。

其次，在欧盟 15 个国家中，目前共有 2100 万个职位是“半工”，占全部职位的 15% 左右。“半工”人数在荷兰增加得最快，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34.8%；丹麦占 24.1%。妇女在“半工”者中占多数，如在荷兰的“半工”妇女达到该国职业妇女总数的 64%。“半工”职位越来越多，一方面固然是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因为西欧国家社会福利摊款负担沉重，企业为节约费用和工资，希望发展“半工”职位。

再次，由于电脑、传真机、移动电话、互联网的普及，西欧国家近年来出现了在家上班的趋势。在欧盟国家中，目前大约有 150 万人加入了“在家上班族”的行列。在家上班是对传统上班观念的冲击和革命。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第一，个人

可以减少上下班途中劳顿，节约时间和交通费用，还可有一个轻松安静的工作环境；其次，对城市来说，可以减少汽车废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对企业来说，可以节约办公用房，减少办公开支等。

建国后，我国的《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 44 小时，实行 5 天半工作制。1994 年修改《劳动法》，实行每周规定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即五天工作制。

从中外生活时间的变化看，劳动时间不断缩短，闲暇时间不断增加，这是共同的趋势。1985 年美国平均日闲暇时间为 5 小时 16 分，加拿大 1986 年为 5 小时 33 分，英国（1987 年）为 5 小时 43 分，芬兰为 5 小时 46 分，日本（1990 年）为 4 小时 51 分。我国城市居民 1997 年为 5 小时 11 分。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的闲暇时间与 1985 年的美国（全国）相比，只少 5 分钟。

从表面上看，生活时间的变化与生产关系和制度变化有密切关系，但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长短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的文明程度。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而节约了劳动时间，并将这些时间用于个人的生活消费。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使人们的文化程度大大提高，对自身精神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产生出将自己从长时间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愿望。

三、生活时间分配与消费革命

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使生活时间分配的项目和内容，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今天 1 小时的生产活动或消费活动，同 100 年前的 1 小时相比，在量上和质上要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几千倍。人们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现在从北京到云南，若乘飞机去，只要 3 个多小时，而 100 年前，乘最快的交通工具，即马车，最快也需要十几天时间。人类在知识力量的推动下，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生活活动的内容和效率都呈加速度变化。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活必需品支出的比例逐渐减少，自由支出的比例逐渐增大。基本实现了与自由支配时间的同步增长。在消费领域完成了从满足生理欲望向满足物质欲望的转变。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次消费革命是在 1980 年到 1990 年。这一阶段是人们追求生理欲望的时期。其特征是人们对衣食及最简单的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获得满足，渐渐取消了一些供应票证，从短缺经济的阴影中走出，商品的数量、花色、种类增多，这时虽然也有假冒伪劣牌货进入市场。但是，从总体上看，供给基本上能够满足需求。这种供给状况，是第一次消费革命的物质基础。

第二次消费革命发生在 1990 年以后，整个阶段大体是要持续到 2005 年左右。这一阶段是人们追求物质欲望的时期。其特征是人们对耐用消费品，其中最主要的是与

住宅相关的物质资料及环境设施的需求。人们开始购买宽敞的住房、别墅，在室内进行个性化装修，安装空调、多台彩电和电话、音响，养殖、种植观赏动、植物，等等。在生产领域，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生产模式已经逐渐消亡，个性化产品得到认同。

对物质欲望追求满足之后，也就是 2005 年左右，我国居民将进入对自我实现欲望的追求，即出现第三次消费革命。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人们追求自我设计、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修养、学习、娱乐观光、衣食住行的生活领域中，人们重视挖掘其文化性及内涵。生产领域中第三产业占绝对优势，人类劳动价值不断提高，文化生产的消费成为时尚。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一阶段物质资料生产不重要，而是在此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在此所述的三次消费革命，是在我国居民消费领域中，消费内容或消费主流变化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是交插渐进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变化又是与生活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在后两个阶段中，人们用于个人生活的时间都大大增加，人们需要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更需要充裕的时间来消费这些产品，闲暇时间的多少已经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尺度。

从全球的情况看，未来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同样在迅速增加，同时，闲暇时间的运用问题会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它将引起人们价值观、社会观和消费意识的变化，西方学者称未来社会是“闲暇社会”。这种社会是建立在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的闲暇社会，是以人的知识力量支撑的文明社会。

第二节 生活时间分配研究历史

从全世界对生活时间分配的研究看，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期、创始期、成熟期和扩展期、广泛应用期。

一、萌芽期

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初期。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叶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人的日劳动时间曾长达 12~16 小时，有的甚至达到 18 小时，同时无产阶级为缩短劳动日而不断地斗争。一些社会学者、经济学者为了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业革命时期长时间工作的特征，做了大量的生活时间尤其是工作时间的调查。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以英国为例，用大量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资料揭露了资本家如何利用正常劳动日，残害工人身心健康的罪行，作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在马恩撰写的一些反映劳工生活的社会调查报告中，使用了生活

时间分配调查的大量资料。

当时，在所有工业发展国家，劳动者日常生活中的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比例的变化，已经引起社会关注。事实上，在该时期，社会已经对生活时间分配研究有迫切的需求。测时学的“时间和运动”理论已被“科学管理”的倡导者们应用到工业实践活动中，在企业里精确计算工人“必要的”和“浪费的”活动的时间数量。被誉为美国“科学管理之父”的F·泰勒（1856~1945）所进行的工人劳动时间及操作的研究，就是运用时间分配研究方法的一个突出例子。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生活时间分配的研究，尚处于萌芽期。因为此时还没有较为科学的调查方法，其间的调查研究，多属于案例调查，从其研究的范围看，还只限于特定的对象，而不是全体国民。从这些研究的目的看，主要有两个，第一，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第二，实现劳动的科学管理。正因为如此，将该时期称之为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萌芽期。

二、创始期

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创始期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以认为它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研究的开始。这个时期，开展时间分配研究的国家主要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等国家也作过一些少量或零星的调查研究。

1924年，苏联社会科学院的斯特鲁米林（Strumilin）以城市工人为对象，实施了生活时间分配调查。该调查分别对男工和女工进行了工作日一天24小时的核算，将全部生活时间分为五类十一小项。第一类是生产性工作，该类包括为社会的和为私人的生产性工作两项。第二类是家务劳动，包括做饭、看孩子、其他三项。第三类是损失时间，包括上下班途中、买东西和排队时间。第四类是生活必需时间，包括吃饭和睡眠时间。第五类是个人所支配时间，包括学习文化、娱乐和请客两项。斯特鲁米林在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研究和城市市区规划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此，人们称他为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创始人。

到1930年，在美国已经开始使用生活时间研究这个概念，兰德巴克（Lundberg, G.）等对郊区居民家庭主妇的生活时间分配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的闲暇活动也予以深入的调查研究。另外，索恩蒂克（Thorndike, E. L.）等心理学者，曾在农林部的指导下，以各州的“农业改良普及所”为依托，实施了对农村家庭主妇的生活时间调查。其后索罗金（Sorokin）等人对生活时间分配设定了明确的调查研究框架。他们在研究城市劳动者问题时，分性别、年龄，从生活活动、意识、社会关系等侧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除此之外，一些国家的广播协会，也实施了大量的生活时间调查。如英国的BBC是从1939年开始每年进行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美国的NBC，日本的NHK，

也是较早进行该项调查活动的组织。日本的第一次国民生活时间调查，是在 1941 年到 1942 年实施的，是为了获得制定各种计划的统计资料，促进国民精神和文化积极向上以及为战时统治当局提供资料而进行的。战后，在 1960 年，NHK 将生活时间分配调查作为独立的调查活动而恢复，以后每 5 年进行一次。各次的样本数有所不同，调查方法也有变化。

在创始期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研究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特定社会群体（如工人、中学生和大学生、农工）每日活动安排方面的研究；第二，闲暇时间利用方面的研究；第三，以一周和一年为周期的时间分配研究。从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主要采用简单的问卷调查，进行活动持续时间和频率的研究，也有一些国家采用“昨日访问法”（由调查员访问被调查者，让被调查者回忆前一日在各个时间上的生活活动内容）和利用交通密度、看戏人数、报纸畅销程度等指标，观察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等情况。

三、成熟和拓展期

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成熟和拓展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统计方法的进步，大众对生活及生活时间分配的关心程度也不断提高，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研究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增进，在抽样调查应用、访问、登录、汇总及数据处理等方面也更加成熟。这一时期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研究有很多，现将影响比较大的时间分配调查予以介绍。

1. 苏联 G·普鲁登斯基 (Prudensky) 的调查研究

1959 年，苏联科学家 S·斯特鲁米林的学生，新西伯利亚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G·普鲁登斯基沿着 S·斯特鲁米林所开创的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道路继续前进。他在同一社区抽出与 S·斯特鲁米林所进行调查研究相类似的样本，实施了工人生活条件的社会调查，该项研究被称为历史比较研究的开创研究。G·普鲁登斯基的研究表明，1959 年工人的工作时间与 1924 年相比明显下降，而且，女工的工作时间少于男工，女工和男工的工作时间差也都有所下降。女工用于无报酬家务劳动的时间都多于男工，但男、女工尤其是女工的家务劳动时间都有所下降。男、女工用于上班途中、买东西和排队的时间都有明显增加，但在这两年，男人在这方面花的时间都比妇女多。这两年男工用于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多于女工，但随时间的推移，男、女工用于这方面的时间都有所下降。个人可支配时间即闲暇时间，男工在此期间略有减少，从一日的 14.7% 下降到 14.1%。而女工闲暇时间从一日的 7.6% 上升到 10.1%。

G·普鲁登斯基本人将一生的精力倾注到对工人生活条件的研究上。在他的领导下，从 1959 年到 1965 年完成了 10 万多人的生活时间调查，作出了工人、技术员、